

地方开放与留学认知互动视角下西安社会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知变迁研究

张 恒

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日

摘 要

本文从地方开放与留学认知互动的视角出发, 以西安为具体观察场域, 探讨西安社会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知变迁及其成因、影响与应对路径。研究发现, 随着西安对韩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教育合作和人员流动不断加深, 韩国逐渐成为本地潜在留学目的国之一, 但韩国学历在西安社会中的认知已由早期的积极关注转向更加理性和分层的判断。其评价逻辑也由“海外学历标签导向”逐步转向“院校层次、专业能力、语言能力与发展回报并重”的综合评估模式。这一变化既受到韩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层次分化、留学供给扩大和回报预期调整的影响, 也与中国留学评价标准变化、西安地方开放进程、就业竞争环境及信息传播偏差密切相关。本文认为, 韩国学历认知变化并非孤立的留学现象, 而是地方开放、跨国教育认知与社会评价互动作用的结果。研究对于优化西安对韩教育合作、完善赴韩留学指导及推进高水平开放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关键词

地方开放, 留学认知, 韩国高等教育学历, 西安, 对韩教育合作

A Study on the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outh Korean Higher Education Credentials in Xi'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Opening-Up and Study-Abroad Cognition

Heng Zh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Received: May 1, 2026; accepted: May 25, 2026; published: June 1, 2026

文章引用: 张恒. 地方开放与留学认知互动视角下西安社会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知变迁研究[J].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6): 9-19. DOI: 10.12677/jc.2026.146133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outh Korean higher education credentials in X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opening-up and study-abroad cognition. Taking Xi'an as a specific local case, it analyzes the causes, manifestations, impacts, and possible responses to these perceptual changes. The study finds tha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tie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obility between Xi'an and South Korea, South Korea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potential study-abroad destinations for local students and families. However, social perceptions of South Korean degrees in Xi'an have shifted from earlier generally positive attention to more rational, differentiated, and stratified evaluation. The evaluative logic has also moved from a simple "overseas degree label" orientation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model emphasizing institutional hierarch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language ability, and expected returns. This change is shaped not only by internal stratification within South Kore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expansion of study-abroad supply, and changing expectations of returns, but also by shifts in China's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overseas education, Xi'an's local opening-up process, employment competition, and information bias in public discourse. The paper argues that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outh Korean credentials are not an isolated study-abroad phenomenon,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local opening-up, transnational educational cognition, and social evaluation. The findings provid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Xi'an's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South Korea, refining study-abroad guidance, and advancing high-level opening-up.

Keywords

Local Opening-Up, Study-Abroad Cognition, South Korean Higher Education Credentials, Xi'an,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South Korea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出国留学市场日趋成熟以及社会人才评价标准与认知的不断调整与重整,韩国高等教育学历(硕士及以上)在中国社会中的认可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降温趋势[1][2]。2018年以前甚至更早些时候,韩国留学因地理距离较近、文化接近性较强、留学成本较之欧美国家相对较低而受到不少学生和家庭关注,韩国学历也一度被赋予较高的海外教育附加值[3][4]。然而,随着海外学历供给扩大、就业竞争加剧以及用人单位评价标准趋于务实,韩国学历的社会认知逐渐由笼统的正向期待转向更加理性、分层和具体的判断。因而,考察韩国学历认知变化,不仅有助于理解中韩教育交流的新趋势,也有助于把握中国地方开放背景下留学选择逻辑的转变[5]。

西安作为中国西部重要中心城市和对外开放枢纽,近年来与韩国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教育合作和人员流动等方面联系不断增强。随着对韩航线恢复、交流便利化提升以及地方开放持续推进,韩国逐渐成为西安学生群体和部分家庭海外升学规划中东南亚范围内重要目标国之一[2][5]。因此,在西安这一具体地方场域中研究韩国高等教育学历认知变化,不仅具有现实基础,也具有揭示地方开放、对韩交流

与留学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价值。

本文所说的“地方开放”，并非笼统意义上的对外开放表述，而是指以城市为单位的在地域在经济联系、交通联通、文化交流、教育合作和人员流动等层面所呈现出的对外联结能力与开放程度。其内涵既包括地方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在国际或区域交往中的制度性开放，也包括城市在现实层面与特定对象国之间形成的经济嵌入、空间联通和社会互动[1]。其外延则可具体分解为经济开放、交通开放和文化教育开放三个维度：经济开放表现为经贸往来、产业合作与投资联系；交通开放表现为以国际航线开通或恢复为重要表征的通达性增强和跨境流动的便利化；社会互动则体现为人文交往、校际合作、青年交流和城市国际传播等活动。结合本文研究对象，地方开放指的是西安与韩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对韩航线的恢复以及对韩人文与教育交流的密度[2][5]。

与此相对应，本文所说的“留学认知”，是指地方社会不同主体(如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等)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及赴韩留学价值所形成的总体理解、判断与评价结构。其内涵不仅包括对韩国留学“是否值得”的价值判断，也包括对院校层次、专业优势、语言要求、社会认可度、就业回报和发展前景等方面的具体认知；其外延则涵盖信息来源、评价维度与考量策略三个层面。具体而言，本文对“留学认知”的三组观察内容为：一是信息来源，如留学中介、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归国案例及高校国际交流渠道；二是评价维度，如院校层次、专业实力、语言能力、就业回报和社会认可度；三是考量策略，如留学成本、申请难度、生活适应、职业预期和家庭风险判断。通过上述界定，本文尝试将“地方开放”与“留学认知”从一般性描述转化为可以在地方社会语境中加以分析的具体变量。

1.2. 文献述评与研究不足

从现有研究来看，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围绕韩国高等教育体系、国际化战略、留学吸引力以及韩国学历在中国的认证与就业回报展开分析，重点讨论韩国高校层次分化、留学供给扩张及中国学生赴韩留学动因等问题[6]；二是围绕地方开放、城市国际传播及对韩交流展开研究，关注地方城市如何通过经贸合作、人文往来和教育合作提升开放水平与国际影响[7]。这些研究为理解韩国高等教育发展及中韩交流格局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就总体而言，既有研究至少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在概念层面对“地方开放”和“留学认知”存在一定泛化倾向。“地方开放”往往被作为宏观背景或政策环境加以援引，较少细化为经济联系、交通联通和文化教育交流等可观察维度；而“留学认知”也常被简化为认可或吸引力，缺乏对其内部评价维度、信息来源和决策逻辑的系统分解。由于缺少这种概念上的操作化处理，已有研究虽然分别涉及地方开放和留学判断，却较难深入说明二者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互动。第二，两个概念之间缺乏关联与互动。关于韩国学历认可度变化的讨论较少进入具体城市和地方社会展开微观分析，而是多停留于全国性留学市场、宏观政策和一般性社会评价层面，因而难以揭示学历认知在不同地方场域中的差异性；而关于地方开放研究虽涉及教育合作和国际交流，但较少将留学认知、学历评价纳入分析框架之中，进而产生对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讨论不足的现象。

综上所述，以西安为观察点和突破口，将韩国学历认知变化置于地方开放与对韩交流背景中加以考察，不仅能够弥补既有研究在地方社会层面的不足，也有助于增强相关研究框架的解释力与区域针对性。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基于以往研究提供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与存在的不足之处，本文以“地方开放与留学认知互动”为主线展开分析，首先考察西安与韩国交流联系的现实基础，说明韩国何以成为西安潜在留学目的国之一；其次分析西安社会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知变迁过程、主要表现及其形成原因；最后讨论这种认知变

化对西安对韩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地方开放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思考与应对策略。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文尝试对“地方开放”与“留学认知”进行对应式分析。前者主要通过经济联系、交通联通和文化教育交流三个维度来识别，后者则主要通过信息来源、评价维度和考量策略三个维度来展开，尝试将二者转化为可以在地方社会文本、政策语境、统计资料和舆论表达中加以辨识和比较的分析单元。若后续进一步开展问卷调查或访谈研究，则可据此围绕“对韩国高校层次的判断”、“对赴韩留学回报的预期”、“主要信息获取渠道”、“家庭决策中的关键考量”等设置具体测量题项，从而增强本文分析框架的可验证性。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从理论上讲，本文尝试将区域国别研究、地方开放研究与留学认知研究结合起来，拓展对留学对象国教育形象在中国地方社会中如何生成与变动的理解。同时，本文适度借鉴教育社会学、信号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的相关观点，将韩国高等教育学历认知视为地方社会在开放进程中对跨国教育资历进行价值判断、信号识别与社会分层再评估的过程。从现实上看，本文有助于为西安对韩教育合作、赴韩留学指导及开放型城市建设提供参考，也可理解为理解韩国学历在中国地方社会中的评价逻辑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样本。同时，通过对“地方开放”和“留学认知”进行概念细化和维度分解，本文可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使地方社会中的跨国教育认知问题能够在更清晰的解释边界中得到讨论。

2. 西安对韩交流联系与韩国成为潜在留学目的国的现实基础

2.1. 西安与韩国交流联系的现实背景

作为西部重要中心城市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西安近年来在经贸合作、人文往来和教育交流等方面与韩国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5]。就经济层面而言，韩国作为东亚重要经济体，与西安在制造业、电子信息、商贸服务等领域具有一定合作基础；就人文层面而言，西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韩国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期关注，使双方在旅游、文化传播和青年交流方面具有较强的互动空间；就教育层面而言，西安高校资源较为集中，国际交流需求持续增长，与韩国高校之间的合作办学、交换学习和学术往来也为双方关系提供了稳定支撑。正是在这种多层次交流背景下，韩国逐渐成为西安对外交流格局中具有现实存在感的重要对象国之一，也为后续赴韩留学认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8]。

2.2. 交通可达性提升与赴韩交流便利化

城市之间的交通通达性不仅是衡量地方开放水平的重要指标，也直接影响人文交往、商务往来和教育流动的活跃程度。近年来，随着西安面向东北亚方向的国际航线逐步恢复和拓展，西安与韩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在现实层面被进一步压缩，双方人员往来更加便利。对于学生群体、家庭以及高校国际交流部门而言，航线恢复所带来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出行方式的改善，更在于它强化了韩国作为“可进入、可接近、可规划”的留学与交流目的地形象[6]。

从留学选择的实际逻辑看，交通便利会显著降低跨国流动的心理成本和时间成本。相较于航程更长、转机更复杂的欧美国家，韩国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性本身就具有优势，而航线恢复与班次增加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优势[7]；对家庭而言，跨国教育的风险感和陌生感会有所降低；对高校和相关机构而言，校际合作、短期访学和联合项目的组织成本也会相应下降[9]。因此，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实际上在地方开放与留学认知之间发挥着连接作用，使韩国在西安社会中的教育目的地形象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2.3. 韩国成为西安潜在留学目的国的原因

韩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西安学生群体和部分家庭重点关注的潜在留学目的国，主要与其相对清晰的比

较优势有关。首先，韩国与中国在地缘距离和文化传统上较为接近，生活适应、饮食习惯和社会环境的陌生感相对较低，这使许多家庭在做海外升学规划时更容易将其纳入考虑范围[6]。其次，与欧美主要留学国家相比，韩国的申请门槛、学习成本和生活费用通常更具可接受性，因而对希望获得海外学习经历、但又希望控制教育投入风险的家庭具有一定吸引力[9]。再次，西安与韩国之间较为频繁的经贸、人文和教育交流，为赴韩留学提供了较多现实信息来源和社会参照，增强了韩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可见度。最后，韩国流行文化传播、高校国际化宣传以及东亚区域交流的持续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青年群体对韩国教育资源的关注[10]。由此可见，韩国在西安并非偶然成为潜在留学目的国，而是在地方开放、社会认知和现实条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选择结果。

3. 西安社会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知变迁过程及主要表现

3.1. 从“积极关注”到“趋于理性”的总体变化

整体上看，西安社会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关注”逐步转向“趋于理性”的变化过程。早期在海外留学仍具有较强稀缺性、韩流文化影响持续扩散以及韩国作为东亚近邻国家更易进入公众视野的背景下，韩国留学在西安学生和家庭中曾具有较高吸引力。相较于欧美国家，韩国在距离、文化适应、费用投入和申请路径等方面表现出一定优势[11]，因此不少人将其视为兼具可行性与国际化色彩的教育选择。在这一阶段，韩国学历常常被纳入“海外学历”这一相对笼统的正向范畴之中，其社会印象更多建立在留学身份本身所附带的象征意义上[10]。

但随着中国出国留学市场逐渐成熟、海外学历供给持续扩大以及就业竞争日趋激烈，西安社会对韩国学历的认知开始发生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评价简单转为负面，而是意味着社会判断方式由过去的泛化乐观转向更细致的比较和更现实的评估。一方面，韩国学历仍然被许多学生和家庭视为具有一定吸引力的选择，尤其对于有明确专业目标、预算约束或东亚发展导向的人群而言，赴韩留学依然具备现实意义[6]；另一方面，社会对其价值的判断已经明显分化，不再将所有韩国高校和所有韩国留学经历视为同质化的“加分项”。因此，西安社会对韩国学历的总体认知趋势，可以概括为由整体性肯定转向分层化判断、由模糊性期待转向理性化评估[7][9]。这一过程反映出地方社会对海外教育资源的判断标准正在不断细化，也表明韩国学历在西安的社会评价已进入更加成熟和现实的阶段。

3.2. 从“学历标签导向”到“能力与院校层次并重”的评价转向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变化体现为总体认知态度的调整，那么更深层次的变化则表现为评价标准本身的转型。过去，不少学生和家庭在考虑韩国留学时，更强调“是否拥有海外学历”这一标签化特征，认为只要具备留学背景，就能够在就业、升学或社会评价中获得相对明显的附加优势。在这一逻辑下，韩国学历往往作为“出国留学”的一种证明而被接受，其内部差异、专业差异和个体能力差异并未被充分展开[12]。

然而，随着社会整体学历结构变化以及用人单位评价机制日益务实，韩国学历的社会评价标准已明显发生转变。如今，无论是家庭、高校还是用人单位，都越来越关注更具实质性的判断维度：毕业院校处于何种层次，是否属于韩国具有较高社会声誉或学科优势的高校；所学专业是否与产业需求和岗位要求相匹配；学生是否具备扎实的韩语或英语能力，能否在跨文化环境中形成真实的学习成果和职业能力；留学投入与未来发展回报之间是否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这意味着，韩国学历在西安社会中的认知基础，已经从单一的“留学身份加值”逐步转向综合的“学校层次-专业能力-语言能力-发展回报”判断模式[11][12]。

从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的视角看，学历本身是一种用于传递个体能力、训练背景和潜在生产率

的信息信号。当海外学历尚具有较强稀缺性时，“韩国留学”本身即可构成一种相对有效的正向信号；但随着留学供给扩大和信号同质化加剧，用人单位与家庭便会转向识别更具区分度的信号，如院校层次、专业能力和语言水平。我国全社会对海外学历的认知与评价的结构性变化正说明，韩国学历正被置于更具体的比较框架中加以衡量。过去“有海外背景即可获得优势”的评价逻辑正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教育经历质量和实际能力的综合审视[8]。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学历认知的变化并非单纯“贬值”，而是其社会评价逻辑从身份性、象征性标准转向实质性、差异化标准的过程。这种转向既反映了中国地方社会对海外教育资源认知能力的提升，也折射出西安在开放发展过程中，对人才质量和教育回报的判断日趋理性[6]。

3.3. 不同群体对韩国学历认知的差异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西安社会”并不是一个内部完全一致的整体，不同群体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的关注重点和评价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从教育社会学视角看，学历并非纯粹的教育结果，而是嵌入社会分层、家庭策略与职业竞争中的一种社会资源。不同群体因所处位置、可支配资源和利益诉求不同，对韩国学历的价值判断自然呈现出差异化特征。这种差异恰恰构成了认知变迁的具体表现[1]。对于学生群体而言，他们通常更关注申请难度、留学成本、校园生活体验以及毕业后的发展空间。在这一群体看来，韩国留学是否值得，往往首先取决于其可进入性和现实可行性，而对学历含金量的判断则常常与专业兴趣、语言学习意愿和个人职业规划结合在一起[2]。

与之相比，家长群体更关注学历的社会认可度、就业回报和长期发展前景。因为对家庭而言，留学经历不仅意味着教育投资，也被视为一种可转化为升学、就业或社会流动优势的文化资本。正因如此，家长对韩国学历认知的变化通常比学生更敏感，也更容易受到就业市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9]。高校教师和国际交流管理者则更关注韩国高校合作的质量、学校层次以及合作项目的持续性和实际效果。他们不会笼统地评价韩国高校，而更重视合作院校是否具有学科优势、项目是否真正服务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目标。

用人单位的判断标准则更趋务实。他们通常不把“韩国留学”本身作为决定性优势，而是更加重视应聘者的毕业院校背景、专业匹配程度、语言能力以及岗位适应能力。在这一层面上，韩国学历的价值往往需要通过个体能力来体现。与此同时，韩国留学归国人员则最直接地感受到社会评价的变化，他们既能体验到海外学习经历带来的视野拓展和能力提升，也更容易在求职和社会比较中感受到不同院校、不同专业 and 不同个人能力之间的回报差异。

由此可见，西安社会内部不同群体对韩国学历的认知并不一致，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分层化和差异化趋势。正因为关注重点不同，韩国学历认知变化也不能被简单概括为“升温”或“降温”，而应理解为一种在多元主体参与下不断分化、不断细化的社会评价过程。

4. 西安社会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认知变化的成因分析

4.1. 韩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因素

西安社会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认知的变化，首先与韩国高等教育体系自身的结构性特征密切相关。近年来，韩国高校内部层次差异日益明显，不同院校在国际排名、学科实力、科研资源、师资水平和社会声誉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分化[13]。一方面，部分研究型大学和优势院校在国际化、科研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具较强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院校在学术影响力、专业特色和国际化认知度上相对有限。对于中国地方社会而言，随着对韩国高等教育了解的不断加深，过去对“韩国高校”的整体性印象开始被更具体的分层认知所取代。也就是说，社会判断已不再停留于“是否为韩国学历”这一单一维度，而

是逐步转向对学校类型、院校层次和专业优势的区别性认知[2]。

与此同时，韩国留学供给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韩国学历原有的稀缺性。早期海外留学资源相对有限，韩国作为邻近国家，其学历在部分地方社会中具有较明显的国际化象征意义；而随着出国留学选择不断增多，赴韩留学路径日趋成熟，韩国学历所承载的象征价值和身份附加值已不如以往突出。换言之，当留学从相对稀缺的教育经历逐渐转变为可比较、可选择的常规路径之一时，社会评价自然会由象征性认同转向更具体的质量判断。再加上近年来部分学生和家庭对赴韩留学回报预期有所调整，韩国学历在地方社会中的认知也随之趋于理性。由此可见，韩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层次分化以及留学供给扩张，共同构成了西安社会认知变化的重要前提。

4.2. 中国留学评价标准与就业市场变化

除韩国高等教育体系本身的变化外，中国整体留学评价标准与就业市场环境的变化，也是推动西安社会调整韩国学历认知的重要背景。过去，在中国出国留学仍具有较强稀缺性的阶段，海外学历本身往往具有较高象征意义。无论是在家庭教育规划中，还是在社会评价和求职竞争中，留学经历都较容易被视为能力、视野和发展潜力的象征。因此，韩国学历在这一时期也往往受益于海外教育加值的一般性逻辑[2][6]。

但近年来，中国留学市场已经从留学稀缺逐步转向留学普及，社会对海外学历的评价标准也相应发生变化。过去“只要出国就加分”的观念正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现实和细化的比较逻辑。用人单位不再满足于将求职者简单区分为国内学历与海外学历，而是更加关注其毕业院校层次、专业匹配程度、科研训练背景、语言能力以及实际工作潜力。同样，学生家庭在进行升学决策时，也越来越重视留学成本、学历回报、就业可行性和长期发展空间之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就业市场竞争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务实取向。尤其是在大城市、省会城市和重点行业岗位竞争中，国内外名校背景、专业优势、研究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都日益成为评价重点。在就业竞争加剧和学历普及化背景下，海外学历这一宽泛信号的区分功能减弱，劳动力市场更倾向于通过院校层次、专业匹配度、语言能力和实践经验等更细化的信号来筛选人才。对西安这样的中心城市而言，这种宏观评价逻辑会迅速传导到地方社会层面，使韩国学历的认知标准从相对宽泛走向更精细、更现实的判断模式。因此，中国整体留学评价标准的变化和就业市场竞争的强化，是西安社会重新审视韩国高等教育学历的重要外部条件。

4.3. 西安地方开放、产业结构与人才评价机制的影响

如果说前两项因素主要体现为对象国教育体系变化和全国性社会评价环境调整，那么西安地方开放进程、产业结构变化和人才评价机制升级，则构成了本文最具地方性解释力的成因。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西部开放枢纽，近年来持续推进开放型经济建设、产业升级和人才强市战略，在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科研创新、高等教育和文化传播等领域不断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伴随这一过程，本地就业市场对人才的要求也日益提高，用人单位、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选才用才中更加重视毕业院校层次、专业适配度、科研能力、语言能力和岗位匹配性。

在这样的地方发展背景下，韩国学历在西安社会中的认知不可能脱离本地产业结构和人才机制而独立存在。对许多学生和家庭而言，是否选择赴韩留学，最终仍要回到一个地方性问题，即这种学历能否在西安的就业和发展环境中转化为现实优势。对于用人单位而言，韩国学历的价值也往往并不由其“海外身份”本身决定，而是要看其是否与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相契合，是否能够满足相关岗位对专业知识、科研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西安社会对韩国学历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地方开放

发展和人才竞争格局变化在留学评价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

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看,学历价值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地方劳动力市场结构、产业升级方向和人才选拔机制的变化而被重新定义。进一步说,地方开放越深入,地方社会对外部教育资源的判断往往越具体、越理性。这是因为开放不仅带来了更多国际接触机会,也带来了更强的比较意识和更高的选择标准。西安与韩国联系的增强,并未简单提升韩国学历的“天然吸引力”,反而促使社会在更充分的信息和更现实的需求中重新评估其价值。因此,西安地方开放、产业结构转型和人才评价标准提升,不仅没有削弱本文问题的地方性,反而恰恰构成了韩国学历认知变化必须置于其中理解的核心场域。

4.4. 信息传播偏差与社会认知调整

除制度和市场因素外,信息传播方式本身也是塑造韩国学历社会认知的重要因素。公众对韩国高等教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直接建立在系统、权威和完整的信息基础之上,而往往受到留学中介宣传、网络舆论、社交媒体经验分享、短视频平台内容以及归国个体案例叙述的影响。在这种传播环境中,韩国留学往往容易被简化为若干具有情绪色彩和传播便利性的标签。这样的叙事在初期能够迅速提升韩国留学的可见度和吸引力,但也容易制造不够稳固、甚至偏高的社会期待。

当公众对韩国留学的预期主要建立在这些简化叙事之上时,一旦现实中的就业回报、社会认可或个体发展结果与预期不符,社会评价便容易迅速发生反转。也就是说,韩国学历认知的变化,并不完全由教育质量本身直接决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信息是如何被组织、传播和接受的。如果传播长期偏向成功案例和单一优势,就可能掩盖不同学校层次、不同专业方向和不同个体能力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当负面经验逐渐积累并被集中放大时,社会舆论又可能从过度乐观转向过度怀疑。

因此,西安社会对韩国学历认知的变化,也应被理解为一个不断修正和去泡沫化的过程。随着社会经验的积累、个体案例的增加以及公众判断能力的提升,人们开始逐渐摆脱早期由中介宣传或网络形象形成的笼统想象,转而根据学校层次、专业实力、就业表现和实际回报做出更具体的判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韩国学历认知的变化不仅是教育价值判断的调整,也是地方社会在信息不断流动和反馈中形成更成熟认知的一种表现。

5. 韩国学历认知变迁对西安地方开放的影响及应对路径

5.1. 对留学选择、家庭决策与青年交流的影响

韩国高等教育学历认知的变化,首先直接影响西安学生群体和家庭的留学决策方式。过去,在海外留学仍具有较强象征意义的阶段,部分家庭在进行升学规划时更强调是否出国这一身份性因素,韩国也因此常被视为兼具可行性与国际化色彩的教育选择。但随着社会评价标准逐渐细化,西安学生和家庭在考虑赴韩留学时,已不再满足于将韩国作为笼统的“海外升学选项”,而是更加关注院校层次、专业优势、语言要求、学习成本以及未来就业回报等具体因素。这意味着,赴韩留学选择正在由一般性的留学偏好转向更加理性的目标匹配,既可能增强部分优质项目和优势院校的吸引力,也可能使缺乏明确定位的普通路径面临更大压力。

与此同时,韩国学历认知的变化还会影响西安青年对韩国教育资源和交流机会的整体态度。当社会对韩国高校的层次差异、专业优势和发展路径形成更清晰认识后,青年群体对赴韩交换、短期访学、联合培养和学位深造的选择,也更可能从过去的印象驱动和情绪性跟随,转向基于个人目标、专业方向和职业规划的理性判断[8][9]。换言之,认知变化虽然可能降低盲目跟风式的留学热度,却有助于提升教育流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地方开放角度看,这种变化并非单纯减少交流,而是推动跨国教育流动从数量型扩张走向质量型优化。

5.2. 对西安对韩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影响

韩国学历认知的变化不仅影响个体层面的升学选择，也会进一步作用于西安对韩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的整体逻辑。过去，在地方开放更多强调国际合作规模和合作覆盖面的阶段，西安高校与韩国高校的合作往往容易以“是否建立合作关系”、“是否开展交换项目”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合作数量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际化水平。然而，随着地方社会对韩国学历的评价趋于理性，教育合作本身也必须回应这种认知变化，逐步从重数量、重形式的扩展逻辑，转向重质量、重实效的优化逻辑。未来，西安在选择对韩合作伙伴时，需要更加关注合作院校的层次和特色，考察双方专业结构是否匹配、培养模式是否具有互补性、项目设置是否能够真正提升学生能力以及合作成果能否转化为人才培养和地方发展资源。

这一合作逻辑的变化也意味着，教育合作不能再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国际交流层面，而应更紧密地嵌入西安自身的开放发展战略之中。例如，面向西安产业升级、高校学科建设和青年国际化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推进中韩之间在科技创新、文化产业、语言教育、国际传播等领域的高质量合作，才能增强教育合作的现实支撑力和社会认可度。进一步看，韩国学历认知变化还会影响西安面向韩国的人文交流和国际传播。教育合作本身不仅是人才培养机制，也是城市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韩国青年如何认知西安、关系到西安社会如何理解韩国，也关系到双方互动能否从一般文化好感转化为稳定、深层和可持续的合作联系。因此，韩国学历认知的调整，实际上推动西安重新思考对韩交流的重点：不是单纯扩大合作覆盖面，而是在更清晰的社会认知基础上，提升对韩合作的人才含量、知识含量与城市影响力。

5.3. 优化西安对韩教育合作与学历认知评估的路径

面对韩国学历认知变化所带来的新情况，西安在对韩教育合作和地方开放实践中，应逐步建立更加科学、系统和具有地方针对性的认知评估与合作优化机制。首先，应加强对韩国高等教育体系信息的系统整理和分层评估。当前公众对韩国高校的认识往往停留于零散印象、个别案例或中介宣传之中，缺乏权威、连续和可比较的信息支撑。地方政府、高校国际交流部门以及相关教育服务机构可围绕韩国高校层次结构、学科优势、国际合作情况、语言要求和毕业去向等内容，建立较为完整的信息整理机制，为学生、家庭和用人单位提供更客观、更分层和更可操作的判断依据。只有让社会更清晰地理解“不同韩国高校之间究竟有何差异”“不同专业的回报和发展路径有何不同”，才能减少笼统化评价和认知偏差。

其次，应完善赴韩留学信息服务和前置指导机制。韩国学历认知中的不少偏差，往往并非源于教育本身，而是源于留学前信息不充分、预期设置不合理以及决策依据过于模糊。因此，在西安地方层面，有必要通过高校国际交流平台、留学服务机构和教育管理部门，为有意赴韩的学生和家庭提供更早期、更细致的指导。例如，在留学规划阶段即帮助其了解学校类型、专业设置、语言能力要求、培养模式、生活成本、奖学金机会以及毕业后的就业与深造方向，从而避免仅凭“海外学历”这一宽泛印象进行选择。通过这种前置性指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学历认知的形成前移，使决策建立在更充分的比较和更现实的目标之上。

再次，应推动西安对韩教育合作由规模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今后西安与韩国高校之间的合作，不宜再单纯以合作数量、协议数量或项目覆盖面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而应突出合作层次、合作内容与合作成效。具体而言，应优先选择那些与西安产业发展方向、高校学科建设需求和青年发展目标契合度较高的韩国合作伙伴，重点推进在理工科创新、文化创意、语言教育、国际传播、区域研究等领域具有互补优势的合作项目。与此同时，还应更加关注项目实施质量，如课程衔接是否顺畅、学分互认是否合理、联合培养是否有助于学生能力提升、合作是否能够形成长期而稳定的机制。

最后，应强化教育合作与城市开放传播之间的协同联动。对韩教育合作不应被视为高校内部的单一事务，而应纳入西安面向韩国开展人文交流和国际传播的整体框架之中。高质量的教育合作不仅能够提升西安青年对韩国的理性认知，也能够增强韩国社会对西安教育资源、城市发展和开放环境的了解，从而在双向认知中形成更具深度的合作基础。西安可以将优质教育合作项目与青年交流活动、城市形象传播、学术互动平台和区域合作叙事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合作从单一人才培养环节上升为支撑城市开放形象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归根结底，韩国学历认知问题的优化，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重塑形象”，而是要通过更真实、更科学的信息支持和更高质量的合作机制，提升西安对韩交流的整体效能，并使地方开放在教育、人文与社会认知层面获得更可持续的发展基础。

6. 结论

本文从地方开放与留学认知互动的视角出发，以西安为具体观察场域，对韩国高等教育学历在地方社会中的认知变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西安社会对韩国学历的认知并未简单经历由“认可”到“否定”的线性转变，而是呈现出由“积极关注”走向“趋于理性”、由“学历标签导向”走向“能力与院校层次并重”的调整过程。也就是说，韩国学历在西安社会中的吸引力并未完全消失，但其社会评价已从过去较为笼统的海外学历加值逻辑，转向更加分层、更加具体、也更加注重教育质量与发展回报的综合判断。这一变化说明，地方社会对跨国教育资源的理解正在不断成熟，韩国学历的价值也日益被置于更现实的比较体系之中加以衡量。

本文进一步认为，这一认知变迁的形成具有多重成因。从对象国一侧看，韩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层次分化加剧、留学供给扩大以及学历回报预期调整，削弱了韩国学历原有的整体性和象征性吸引力；从中国社会和地方层面看，留学评价标准变化、就业竞争环境加剧、西安地方开放进程深化以及本地人才评价机制升级，共同推动社会对韩国学历作出更为细化和现实的判断。此外，留学中介宣传、网络舆论与个体经验传播所形成的信息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认知预期与现实反馈之间的落差，使社会评价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和去泡沫化的过程。

从更广的意义上说，韩国学历认知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留学现象，而是地方开放、跨国教育认知与社会评价机制互动作用的结果。以西安为例展开讨论，不仅有助于弥补既有研究中在韩国学历认可度变化缺乏地方社会考察的不足，也有助于揭示地方开放背景下教育合作、青年流动与国际交流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分析表明，优化韩国学历认知问题，关键不在于简单重塑其社会形象，而在于通过更科学的信息支持和更高质量的教育合作，提升地方社会对外部教育资源的判断能力和利用水平。这对于西安提升对韩教育合作质量、优化留学指导服务以及推进高水平开放，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当然，本文主要从地方社会认知变迁角度展开分析，更多仍属于基于现实观察与理论归纳的讨论。未来若能结合更系统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以及跨城市比较研究，对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韩国学历认知进行实证检验，将有助于进一步验证并拓展本文结论。

参考文献

- [1] 朴知淑. 中国留学热潮“降温”赴中韩国留学生 6 年减少 80% [N/OL]. 韩国今日亚洲, 2023-12-26. <https://cn.asiatoday.co.kr/view.php?key=20231226000913205>, 2026-05-30.
- [2] Green, C. (2015) Internationalization, Deregul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Korea: An Historical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4, 1-13. <https://doi.org/10.5430/ijhe.v4n3p1>
- [3] 张峰铭, 洪成文. 高等教育何以应对人口危机: 日本与韩国的破局之策[J]. 比较教育研究, 2024, 46(12): 17-26, 36.
- [4] 赵俊芳, 崔鸣哲. 21 世纪智慧韩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38(5): 1-6, 37.
- [5] 徐轶玮. 论构建陕西与日本、韩国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平台的必要性[J]. 项目工程, 2025, 3(5): 99-101.

-
- [6] Lee, M. (2013) Why Chinese Students Choose Korea as Their Study Destination in the Global Hierarchy of Higher Education? *KED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10**, 315-338.
- [7] Cho, Y.H. and Palmer, J.D. (2013) Stakeholders' Views of South Korea'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Higher Education*, **65**, 291-308.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12-9544-1>
- [8] 李松林, 凌磊. 韩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与实践——基于留学生的数据分析[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2(3): 27-34, 141-142.
- [9] Jon, J., Lee, J.J. and Byun, K. (2014) The Emergence of a Regional Hub: Compar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Choices and Experiences in South Korea. *Higher Education*, **67**, 691-710.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13-9674-0>
- [10] Kim, H.M. and Na, T.J. (2022) The Ambiguous Belong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South Kore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Korea Journal*, **62**, 196-225.
- [11] 西安机场新航季将新开加密多条国际地区航线[EB/OL]. 2024-03-26. http://www.caacnews.com.cn/1/5/202403/t20240326_1376854.html, 2026-03-31.
- [12] 魏玉亭, 高长完. 韩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 动因、战略与挑战[J]. 比较教育研究, 2019, 41(6): 67-74.
- [13] Byun, K. and Kim, M. (2011) Shifting Patterns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Korea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5**, 467-486.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10375307>